

导 论	1
第一章 袁世凯上台的必然性	11
第一节 从中西对比看中国的民主基础	11
第二节 袁世凯具有暂时的权威合法性资源	19
一、袁世凯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势力	19
二、因赞成民主共和而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	24
三、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对袁世凯上台的支持	28
第三节 过渡性强权统治出现的必然性	35
一、清王朝中央权威的坠失	36
二、缺乏民主基础的中华民国	40
三、过渡性强权统治的适应性	57
第二章 袁世凯的政治理念及专制集权的形成	67
第一节 袁世凯的政治理念	67
第二节 集权措施	72
一、破坏《临时约法》和逼选总统	72
二、抵制《天坛宪草》和解散国会	77
三、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和修正《大总统选举法》	79
四、集中军事和行政权力：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堂和政事堂	83

1912 — 1916 年

Mulu

目
录

BeiJing ZhongFu
TongZhi YanJiu

第三章 袁世凯政权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 现代化导向	85
第一节 具有现代化导向的行政改革	85
一、推行西方式的文官制度	85
二、试行地方自治	93
三、完善民初的民族政策	96
第二节 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	99
一、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	100
二、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	103
三、袁世凯经济思想及政策述评	113
第三节 引进西方教育文化理念及整合意识形态 的措施	115
一、发展现代教育文化的思想	115
二、新式教育文化政策的出台	119
三、整合意识形态的思想	128
四、复古尊孔与新闻管制政策	131
第四章 袁世凯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打击、利用 和控制	136
第一节 袁世凯与革命派	136
一、限制与反限制	136
二、短暂的合作	139
三、彻底决裂	142
第二节 袁世凯与立宪派	147
一、相互利用	147
二、勉强合作	157
第三节 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	159
一、袁世凯与阎锡山	159
二、袁世凯与张作霖	162

三、袁世凯与唐继尧	164
四、袁世凯与陆荣廷	167
第四节 袁世凯与黎元洪	169
第五节 袁世凯与部属	175
一、提拔和笼络	175
二、猜疑和排挤	182
第五章 由专制集权走向复辟——袁世凯统治 的崩溃	188
第一节 洪宪帝制的成因	188
一、袁世凯的封建帝王思想	188
二、袁克定及“六君子”的怂恿	191
三、列强的支持	196
四、袁世凯错误估计形势复辟帝制	199
第二节 洪宪帝制缺乏权威合法性基础	201
一、皇权权威合法性遭到严重削弱	201
二、洪宪帝制缺乏道义基础	205
三、袁世凯缺乏复辟帝制的实力	207
第三节 帝制引起权威合法性危机总爆发	215
一、护国战争的酝酿与爆发	215
二、众叛亲离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226
三、袁世凯忧惧而死	240
结束语	243
参考书目举要	247

导 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体现为一个过程,由于历史过程的演进,“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①因此,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②;“历史地”评价历史过程及其人和事,最根本的要求是把评价对象严格地定位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和历史环境中,然后进行具体的分析。历史评价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方面进行评论、判断,肯定一切进步的东西,否定一切反动的东西。当然,历史评价是研究主体的一种认识活动,难免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殊性而运用一系列具体的标准,如阶级标准、道德标准等等,但是,一切历史评价的具体标准都应该与这一总的、根本的标准相统一、相一致。譬如,从每一阶段的具体历史出发,对人类历史上的若干剥削制度,马克思是谴责和鞭挞的,但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上,马克思主义又承认剥削阶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在一定限度内肯定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承认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并给予一切剥削制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在历史认识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要求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用没有道德判断在内的历史评价去认识历史过程及其人和事,历史认识不可能完整周密,不可能得出历史的启示和借鉴;用非历史的道德评价去认识历史过程及其人和事,只能得出抽象的没有意义的道德判断,同样也不能真实地认识历史。^③

袁世凯是一个横跨晚清与民初两个历史时段具有重要影响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③ 以上观点参见张艳国:《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第244~254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历史人物,作为晚清权臣,后来又担任民国总统,他经历了一个新旧更迭、斗争复杂的动荡时代,参与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功过是非难以简单评说。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仍存在着偏重运用道德标准、忽略运用历史标准的倾向。如何将其放在整个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历史主义为指导,结合道德评价来进行深入而又全面的考察,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史学界一般以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作为清史的终止,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的开端,而辛亥革命的时限又界定在1894年到1911年。所以,长期以来,1911—1919年特别是1912—1916年北京政府的统治这一段历史,相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其他时段全面深入的研究而言,还显得不够。而1912—1916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的统治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从这时起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迈入了较19世纪更为深刻的现代化进程。历史具有连续性,这段历史所造就的许多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一直影响到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和追思,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此后的军阀混战、国民革命、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而且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所以本人以“1912—1916年北京政府的统治”为题,在已有的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对袁世凯上台的历史必然性、袁世凯的治国理念及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袁世凯与各政治派别的关系以及后来复辟帝制最终失败的原因进行探索性的研究。试图对1912—1916年北京政府的统治作出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解释和评价,并试图客观评价袁世凯。

最早研究袁世凯的著作有日本人内藤顺太郎的《正传袁世凯》(1913年出版)、关矢充郎的《怪杰袁世凯》,成书较早,其资料

有参考价值。从袁世凯在位时起,国人就开始对袁氏文稿、书牍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对袁氏生平和帝制自为有初步研究。成果有《袁大总统书牍》(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版)、《容庵弟子记》(沈祖宪等编,1913年铅印本)、《袁大总统文牍类编》(上海会文堂书局1929年版)、《袁氏家书》(上海中央书局1935年版)、《养寿园奏议辑要》(沈祖宪辑录,项城袁氏宗祠本1937年版)、《袁氏盗国记》(黄毅编,上海民国书社1916年版)、《袁世凯全传》(野史氏著,上海文艺编译社1917年版)、《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白蕉编著,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还有后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陈伯达著,人民出版社1943年版)、《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黎澍著,三联书店1948年版)。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资料翔实,常为人引用。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然不是历史研究,但侧重道德评价,对新中国袁世凯研究影响很大。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虽不是袁世凯研究专著,但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的开山之作。青谷、林言椒的《袁世凯》(三联书店1963年版)是新中国第一本袁世凯传记。港台学者著有《袁世凯评传》(韩作著,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63年版)、《袁世凯窃国记》(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袁世凯评价的主调就是“窃国大盗”。1980年出版的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亦尚未完全摆脱传统观点,称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但是该书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可谓是以基本史实研究传述袁氏一生历史的开山之作。胡柏立著有《袁世凯称帝及其败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侯宜杰著有《袁世凯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修订为《袁世凯评传》(侯宜杰著,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996年又进一步修改成《袁世凯全传》(侯宜杰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侧重描述袁世凯一生的政治活动,突出其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形象,同时肯定了他在陆军近代化中所尽的一份力量,肯定了他在清末新

政中的政绩,及在推翻清廷建立民国过程中的客观作用。王钦祥、宰学明著有《袁世凯全传》(青岛出版社1994年版),万仁元著有《袁世凯与北洋军阀》(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总之,以上传记对袁世凯在政治上的背信弃义、玩弄权术等着墨很多,而对其他则挖掘不够。新近出版了《袁世凯家族》(纪能文著,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孙中山与袁世凯》(林风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袁世凯真传》(冯年臻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走向客观。其中《袁世凯真传》辩证地分析了历史人物的具体历史位置及历史作用。例如,作者认为“袁世凯在朝鲜,在连续挫败日本制造的壬午、甲申兵变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其后驻节朝鲜,在外交舞台,他纵横捭阖,与日、俄等列强斗智斗勇,平息了多起惊心动魄的外交事件,使中日战争推迟了十年”。从清末新政到筹备立宪,从普及教育、兴办实业,到创办警察、改革司法,袁世凯先着祖鞭,做了许多人们料想不到的事。“辛亥革命,袁世凯东山再起,怀着某种投机的心理,但客观上助成了民主共和国诞生。”郭剑林、纪能文著有《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廖一中著有《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李自有著有《洹上钓客:袁世凯安阳养疴前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溯源著有《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出版社1997年版),张弘光编著有《总统皇帝袁世凯》(台北大村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版)。研究袁世凯统治时期史的著作有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文公直的《北洋派的起源与崩溃》,谢彬的《民国政党史》,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钱实甫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书史料丰富,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的许多内幕,但因资料未注出处,学术价值不高。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引用了大量原始材料,但也未注明出处,因史话性质,有些内容有明显的演绎成分。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北洋

军阀史稿》、《北洋军阀史》是不断完善的研究北洋军阀的著作，《北洋军阀史》一书认为，北洋军阀集团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惟命是从和丧权辱国等等都起了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转移政权的主要力量，是中华民国时期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从统一走向统一的过渡期，北洋军阀集团在改革军制方面的成效是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的。另外，还有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袁世凯传记资料》（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全面论述了袁世凯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情况。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对袁世凯时期的研究也具有独特的观点。此外还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张静如、刘志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北洋政府时期经济》（黄逸平、虞宝棠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在国外，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曾试图客观地研究袁世凯及其统治时期史，加拿大籍学者陈志让的《军绅政权》，分析了1912—1928年间军绅政权的性质以及这一政权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用以解释在军阀统治之下，中国之所以不能现代化的原因。欧里斯特·扬格所写的论文《洪宪帝制：现代保守主义》认为“现代保守主义”是对有组织而且步调一致的进步运动的一种有意识的对抗运动，但是是允许改革的。中国在民国以后也产生了这种保守主义，它对传统的重新诠释与其谋求变革的思想模式是相关连的。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是现代化保守主义的一个例子，是对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一种反应。它是将传统的一些因素重新加以界定，对西方国家的经验加以借鉴，而使中国逐渐现代化的一种力量。陈志让所著《袁世凯》（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将袁氏的兴起与衰微纳入时代背景加以分析讨论，揭示袁氏政策所出之因。欧里斯特·扬格还著有《袁世凯大总统：民国初年的开明政治和专制

统治》(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在该书中作者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局势的混乱、文化传统的坠失、社会心理的失范进行探讨,指出这是袁后来依赖“皇帝”的感召力来维系人心的原因,得出袁氏称帝与其说纯为其个人野心,还不如说是由于政治及文化的力量促成的因素来得大的结论。认为在民族意识高涨、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袁世凯在集权专制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袁世凯与社会脱节,不知运用民众及士绅的力量,缺乏社会基础是导致失败的最大原因。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研究袁世凯的论文只有二三十篇。自改革开放至今,这种沉寂的局面被打破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80年代以后,对袁世凯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政治、军事,还扩展到财政、经济、交通等方面,如吴兆清、邓亦兵对袁用西方资本主义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举措在近代军事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①。此外,还有沈家五的《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张学继的《论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虞和平通过对1912—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四十多项经济法规的具体分析与综合考察,认为“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有的论文对传统的观点还有所创新,如对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问题过去一直以“窃国”骂名相加。90年代以来,有不少论者通过进一步挖掘材料,并经过对当时中外多种政治力量、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常宗虎认为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

^① 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98年第3期。

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须“窃取”;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选择了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由此得出结论,袁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取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① 还有人对袁世凯在外交上的卖国行为,如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也试图以“弱国无外交”的角度,给予合乎客观情理的解释。^② 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袁世凯的主要成果有金子肇的《袁世凯政权的地方财政机构改革》(《历史学研究》1999年第5期),《袁世凯政权对国家统一的争取及咨询机关的作用》(《东洋学报》1997年第9期),闵斗基的《辛亥革命史——中国共和革命(1901—1913)》,渡边淳的《袁世凯政权与周学熙》,横山宏章的《孙中山与袁世凯》(岩波书店1996年版)。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特点:

1. 大陆和台湾学者所写的袁世凯传记大都记述传主一生的活动和事迹,侧重点在袁世凯如何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当选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皇帝,如何与民党、立宪派斗争,破坏民主,实行高压政策。有的对袁世凯清末“新政”中的贡献有所肯定,但对袁世凯究竟如何治理民国很少研究。同时,对袁世凯的评价角度单一且有失偏颇:其一,大多数论者单纯运用道德评价标准,注重批判袁世凯的狡诈狠毒、富于政治权谋、不择手段、出尔反尔、寡廉鲜耻、权利欲极强、破坏民主、复辟帝制,一提到袁世凯就使人联想起卖国贼、窃国大盗;一谈起袁世凯统治时期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政治专制、经济凋敝、文化黑暗。其二,为适应政治宣传的需要,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评价袁世凯,论证其反动性。其三,

^① 常宗虎:《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

^② 张神根:《对国内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

片面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先进性,忽略当时不完全具备实行民主共和制条件的现实,并以此为依据简单地评述袁世凯统治的反动性、落后性和非法性。

2. 国外的研究者虽作了一些努力,试图将袁世凯放在民国初年的社会背景下,客观冷静地分析其政策举措出现的原因、合理性与失误之处,但由于他们掌握的史料有限,研究工作只是初步尝试,还不够深刻、系统。

3.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系列研究袁世凯统治的论文,客观性科学性在增强,有的评述了其对外开放、重农、重工、重商、振兴实业等扶植资本主义的政策;有的论述了其财政、金融、货币政策及其对社会经济的调控和指导作用,还有些文章论及了袁世凯统治时期文书工作制度、外交活动等。但这还只是一些零星的非系统性的研究,对袁世凯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现代化导向及失误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评价。

所以,对袁世凯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1912—1916年的统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有待于从新的视角进行客观地分析与评价。

本书使用大量的第一手民国时期的政府档案、报刊文献、时人笔记、回忆录、各种史料汇编,吸收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根据当时社会背景,论述袁世凯为首的1912—1916年北京政府的统治,研究其上台的必然性、治国理念及对统治的影响,客观而系统地评价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政策。通过探析袁世凯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展示其政治运作。从全新的角度,评价其对历史潮流的顺应和逆违,揭示其在社会转型期的地位和作用,分析袁世凯帝制失败的原因。本书的学术贡献主要是:

1. 客观分析了袁世凯上台的必然性,借助于现代政治学理论,比较深入地论证了袁世凯强权统治建立的必然性。过去史学界一直认为袁世凯的上台是他阴谋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结果,孙中山让位是受袁世凯欺骗所致。近年来,已有人撰文认为袁世凯上台有一定的必然性,袁氏集团的实力较革命派大,孙中山革

命派势力不够。本书从袁世凯赞同共和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袁世凯集团本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得到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扶持三方面,全面分析了袁世凯上台所具有的暂时的权威合法性资源,说明了袁世凯上台的必然性。在多维考察了民初中国社会背景后认为: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旧的封建制度已被打破、而新的民主制度又一时无法建立起来的严重失范状态。对于这种失范状态,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无法对其实行整合。指出:只有实行专制强权统治才能摆脱这种危机。也就是说,一个既具有现代化导向又具有强权专制特点的过渡性政府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这一政权的存在是中国在由封建专制向民主迈进的过程中所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用社会转型需要渐进的量变积累的理论 and 失范需要强权整合理论,论述这一政府的适应性,从而揭示了袁世凯上台的深层必然性。

2. 整体、系统、相互联系地研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的统治。过去人们认为袁世凯的统治就是倒行逆施,近年来已有人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策分别进行了研究,但仅仅孤立地研究其政治举措,得出他所建立的专制集权统治是反动的结论;仅仅孤立地研究其文化教育政策,简单地认为复古尊孔运动、新闻管制政策是反动的。这些结论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本书将袁世凯统治置于民初社会缺乏民主基础的背景之下,以袁世凯政治理念为基点研究袁氏政治上的集权措施及过程,同时从袁氏实行文官制度、地方自治及完善民族政策等方面分析其政治统治的现代化导向。以经济理念为基础研究袁世凯政权扶植和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及影响。以教育文化理念为依托论证袁世凯政权在教育文化领域内的政策也具有现代化导向及整合作用。并以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三方面的表现对其统治作出整体性评价:认为在复辟帝制之前,袁世凯政权在政治上实行专制强权,继承南京临时政府的现代化方针政策,实行具有现代化导向的行政改革,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发展,在教育文化上提倡现代文化教育的发

展,同时用传统的儒家文化整合意识形态,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强权统治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

3. 以全新的视角论证袁世凯统治崩溃的必然性。传统的观点认为,袁氏统治的崩溃是由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各派政治势力、各阶层民众的联合反对所致,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本书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采用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整体联系的研究方法,从皇权的合法性、袁氏个人道德、袁氏对军队的控制力、袁氏政绩等方面分析了袁氏帝制失败政权崩溃的深层原因。最后,袁世凯错误估计形势复辟帝制,结果引起了权威合法性危机的总爆发,立宪派与地方实力派联手反对,列强出尔反尔,部属离心离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全国各界人民愤怒声讨,逆潮流而动的袁氏政权从此崩溃。本书认为袁世凯专制集权走过了头,洪宪帝制不具有合法性是袁世凯统治崩溃的真正原因。本书的结束语部分在客观而恰当地评价袁世凯的复杂历史地位与作用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努力。

本书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避免片面的道德评价,克服传统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与片面性,运用多学科、多视野的研究方法,尊重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将以袁世凯为首的1912—1916年北京政府的统治作为主线,揭示袁世凯上台的历史必然性,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理念及其政策措施;与当时中国政坛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及对其统治的影响;政权失败的复杂原因等,从而对袁世凯及其1912—1916年的统治给以合理的历史定位和评价,凸显其在民初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弥补国内这段历史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

本文的基本框架是:第一部分,论证了袁世凯上台的必然性;第二部分,论证袁世凯政治理念及专制集权形成的过程;第三部分,论证了袁世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理念与政策的现代化导向;第四部分,论证了袁世凯与各政治派别的关系;第五部分,论证了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成因和失败原因;第六部分,客观评价袁世凯的复杂历史地位与作用。

第一章 袁世凯上台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继之出现的是袁世凯的上台及其建立的专制强权统治。一般的观点认为,袁世凯上台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结果,其强权统治破坏了民初的民主实践,完全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对历史作一番深刻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民初袁世凯的过渡性专制强权统治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这种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中国传统所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及其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第一节 从中西对比看中国的民主基础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差异基础上孕育出了不同的社会模式。

1. 从社会组织结构来看,按照法国著名学者杜尔凯姆的观点,人类社会个体之间存在着两种聚合方式。一种是同质个体之间的机械团结;另一种是异质个体之间的有机团结,他们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机械团结是指以一种强烈的共同集体意识为基础,同质个体效忠于某一共同信仰、规范和价值,在行为上协调一致,以实现群体的团结和整合。在这种社会中,集体意识不鼓励乃至抑制个性差异的发展。在异质个体社会中,异质个体之间相互补充,在功能上相互依赖,联合社会个体的纽带或聚合力是自愿的横向的契约关系,这样的社会鼓励人的个性发展。^①

近代西方社会是一种异质个体社会。在近代西方文明发祥地

^① 萧功秦:《萧功秦集》,第4~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古希腊地区,由于各原始部落之间,很早就出现了异质共同体之间的频繁的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进而促进了各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分化,并最终迅速地导致了原始血缘纽带关系的崩溃,这种社会内部异质化和经济私有化过程,造成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尖锐阶级对立,并使奴隶制国家应运而生。另外,由于各城邦贵族、平民集团的利益多元化和异质化,又导致国家内部采取以互补性的契约关系为纽带的古典民主政治制度,作为综合多种利益与整合政治秩序的制度手段。^①西方“自希腊以来就始终存在着异质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作为联结这些异质个体的契约性关系纽带……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终于形成了杜尔凯姆意义上那种以高度的异质互补关系为基础的‘有机团结’型的近代工业社会……与这种社会‘几何’结构有关的制度文化特征,如个体自主性、自治性、多元性、契约性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西方古代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②。这些因素为西方民主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

而近代中国社会则是一种同质个体社会。在古代,中国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村社内部社会分工与分化速度极其缓慢,在各同质共同体应付共同面临的环境挑战的时候,在宗法血缘纽带没有瓦解前,专制国家就出现了。这种专制国家把同质个体与同质共同体(村社)吸纳过来,作为自己的基层组织。原先的宗法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也就随之改造为专制国家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③。直至清末,“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同质个体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机械团结还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④。在同质个体社会

① 萧功秦:《萧功秦集》第8~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萧功秦:《萧功秦集》第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 萧功秦:《萧功秦集》第9~10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 萧功秦:《萧功秦集》第1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中,人的个性得不到自主的发展,集体意识不鼓励乃至抑制个性差异的发展。于是支持民主政治制度的文化特征,如个体自主性、自治性、多元性、契约性等等均没有形成。

2. 从政治文化方面来看,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有着悠久的法治契约文化传统。古希腊、古罗马思想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法制观念。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法律规定的条例总的说来可能是最合理的,人的美德是守法。^①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不受主观愿望影响的理性,主张把法律至上作为好国家的标志,“法治”一词具有三项规定:第一,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或普遍的利益而实行的统治^②;第二,这是守法的统治;第三,法治意味着对自愿的臣民的统治。中世纪早期日耳曼各个民族认为法律是属于民众、人民或部落的,也是属于各部落中具有成员资格的每一个人的。它好像是一个社会集团的属性和财富,借法律的力量才把社会集团维系在一起,法律作为必要的规章制度主要是为了维持人民之间的和平状态并防止和平被破坏。这种法律属于人民、人民又服从法律统治的观念在中世纪已深入人心^③。并且,中世纪欧洲人在原来对法的认识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认为法律无所不在,并开始用契约关系来解释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例如,约翰 1159 年写作的《论政府原理》就集中反映了这种法律观念。他认为,法律在人类关系中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纽带,国王和臣民都要受法律

①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第 105 页。转见沈汉、王建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形态学的考察》,第 349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7、8 节。转见沈汉、王建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形态学的考察》,第 349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第 244 页。转见沈汉、王建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形态学的考察》,第 349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的约束,国王和暴君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对待法律的态度上。^① 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政治问题逐渐世俗化了,自然法和理性主义广泛兴起。例如,法国学者阿尔色修斯指出:“人们结成集团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人性内在的组成部分。”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是一种“政府契约”关系。社会集团的存在是“广义的社会契约关系”的表现。“人们借助默契成为一个社团的居民,并分享由该社团所创造和认可的种种财物、服务和法律”。社团由简单到复杂可分作五类:“家庭、自愿结合的团体、地方村镇、省市以及国家。在较低级的社团中缔结契约的是个人,而在一些更高级的团体中缔约的双方是基层社团而不是个人,这样便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契约。通过这些社会契约的缔结,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各种社会团体就诞生了”^②。国家根据法律把权力授给各级行政长官,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总之,阿尔色修斯认为缔结契约和同意的原则是整个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并用契约论来说明国家权力,视契约的有效性为一种自然法原则。西方的政治文化尊重个人及其个性,强调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培养了人民这样一种政治心理,法无处不在,它是最合理的,人的权力是通过立法来确定的,法尤其是宪法是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国家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就是一种法的统治,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和契约关系来维持。有了丰富的法治观念和发达的契约文化传统,就为人们自觉地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打下基础。从而为民主的产生和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儒家的人伦政治思想,它是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家族主要靠伦理关系来维持,特别强调

^① 转见沈汉、王建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形态学的考察》,第34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转见沈汉、王建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形态学的考察》,第366~36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